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九〇期 ——
(二〇一一年三月七日发布)

本期目录 (zk1103a)

【往事如烟】	昨夜星辰昨夜风——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刘辉宣
【当事者说】	回味“九一三”	程 光
【亡灵祭坛】	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韩三洲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往事如烟】

昨夜星辰昨夜风——北京四中的红卫兵往事

• 刘辉宣 •

(刘辉宣，笔名礼平，北京四中六八届高一(五)班学生。一九四八年九月生于张家口，一九五一年随部队进驻北京。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四中。一九六九年入伍，当过炮手、侦察兵、炊事员、报道员，历任班长、排长、宣传干事。一九八零年在北海舰队某部任职期间发表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引起争议与批评，翌年因之转业。回到北京，先后在市政府、工人日报社、光明日报社工作，当过教员、编辑、主编，获副编审职称。二零零八年从鲁迅文学院退休。)

文化大革命中曾狂热流行过一个口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一首关于这“血统论”口号的歌曲，唱遍了全国。这首著名的红卫兵“战歌”就是我谱写的。

人们普遍认为《出身论》导致遇罗克被枪毙的悲剧。据我所知，遇罗克之死恐怕与《出身论》并没什么关系。这倒不是在推托责任。当年我和遇罗克属于两个阵营，我编了那首歌，遇罗克批判了我们，结果他却被杀了。“伯仁非我所杀，伯仁因我而死。”

我与遇罗克当年近在咫尺。他的文章发表在《中学文革报》上，那正是我们学校的同学办的，编辑部就在离我宿舍不远的教研室小院。我有个同班同学叫史康成，也是他们一伙的。当

年我们为这口号打得不可开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九六八年遇罗克被捕，史康成受牵连。没过两天，我也被工宣队关进学校，正好与史康成为邻。我们俩，一个是因为鼓吹“血统论”，一个是因为反对“血统论”，殊途同归。

“出身”这玩意儿今后的人恐怕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但在那时候，却是我们头顶上的天空。“血统论”当时上至中央，下至群众，全社会都反对——它本来就很烂。遇罗克的悲剧是他对文化革命的质疑，作为思想者和殉道者，他提出的问题远比我们深刻得多。后来才知道他的死不是因为《出身论》，而是在“文革”前不久发表的反驳姚文元对《海瑞罢官》批判的文章，那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他比我们站得高，其历史价值和理论价值远远高于《出身论》。这绝非抹煞《出身论》的意义。那篇文章我看过，犀利，雄辩，知识广博，文彩飞扬。他是出类拔萃的人，走在时代前面的人，可惜哲人早逝了。

那口号流行不到半年就臭街了，连我们自己也知道错了，甚至一开始就知道那是错的。他的被捕让我不解：是我们错了，怎么却把他抓起来了？一九七零年他被枪毙时，我在江苏农场，听到这个消息更是震惊得无以名状：这到底想干什么？

红卫兵喊出那口号带有很大的胡闹成分，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这是我始料未及的。那首该死的歌，让我对不住周围的很多人。我们班主任叫田佃，是个青年教师，只比我们大七八岁。后来当了四中的副校长。田老师六十岁退休时，点名要见我这个班长。徐金波他们和我一合计，说干脆给老师祝寿吧。寿宴中拉起家常，当我知道田老师的孩子与我们的孩子差不多大时，十分惊奇，于是问：“您什么时候结婚的啊？”田老师用筷子点点我鼻子，说：“你还问呢，都是你的那个破歌，害得老师好久找不着老婆！”

“文革”中我们一指头也没动过田佃老师。他很有威信，同学们都喜欢他。但政治上的魔咒比什么都厉害。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

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

就此而言，“血统论”选错了对象，为我们自己在“文革”中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人家可什么都不怕。正是这一强大对手，最后把我们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

红卫兵运动有其复杂性——怀疑过，思考过、反抗过，其中包括不少当年的学生领袖。我称他们为红卫兵中的理智派。相对而言，红卫兵中另有一帮疯狂派。这两派的能量都不小，只不过还没来得及冲突碰撞，就土崩瓦解了。当时四中有一个学生领袖群体，都是高三的学生，为首的是孔丹。他“文革”前就是北京市的学习标兵，“文革”中写文章、办报、组织团队，是

个很有才华的人。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精英，像马凯、薄熙永、秦晓和李三友等。我们这些校友直到现在还团聚在他们身边，可见其威信和影响了。这是四中。另外还有八中的陈晓鲁，六中的董良翮，都是“文革”初起的理智派。陈晓鲁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到处泼冷水，老是说：“这是干什么啊？你们瞎闹什么啊？有什么意思？”对“文革”充满无奈和不屑。我校有个徐小岩，徐向前元帅的儿子，还有杨东明，杨成武上将的儿子，都是高材生，在同学中也很有影响，但凡事不卷入，不闻不问。

孔丹他们热情洋溢，本想在“文革”中有所作为，结果差点儿送了命。孔丹和董良翮都被“中央文革”抓了起来，一九六七年判决书都拟好了，要不是周总理干预，他们肯定死在遇罗克前头。红卫兵运动爆发后一个多月了，四中就一直顶着，全校都顶着，就是不成立红卫兵，一直到“八一八”前夕，听说毛主席要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才匆匆成立了。

一九六六年春夏之际那三四个月中，形势变化莫测，令人目不暇接。红卫兵是从海淀区的几个重点中学，主要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起家的。一些学生对教育体制有意见，“文革”一起，率先罢了课。不久工作组进校，他们就跟工作组顶了牛。工作组在共产党政治传统中从来就是钦差大臣的角色，谁敢惹？可学生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天不怕地不怕，在圆明园的野地里开了个会，写了篇《无产阶级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红卫兵”，造工作组的反。这就是红卫兵的由来。

毛主席见他们敢反对工作组，就想通过他们打倒刘少奇。因为工作组是刘少奇派下来的。除了工作组全数撤回，毛主席还亲自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的“造反精神”。于是这把火烧遍全中国，刘少奇遭到重挫。乱天下者红卫兵也。

那一阵，江青对红卫兵那股亲热劲儿，让人肉麻，今天抱着这个掉眼泪，明天搂着那个擦鼻涕，反复暗示这些红卫兵：你们要挖出“中国的赫鲁晓夫”来才算数啊！当然指的是刘少奇。可那帮红卫兵就是按兵不动，心里明镜儿似的——坚定地站在刘少奇一边。最早揭竿而起的海淀区的红卫兵，已经跟江青暗顶了起来。城区的红卫兵就是在这时候走上“文革”舞台的。

“文革”初起时的气氛，在很多方面暗合了人们的普遍情绪。但“中央文革”那帮人，包括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特别是江青，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让人看不过去。城区的红卫兵做事的风格与海淀区的红卫兵很不相同。如果说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是“红卫兵”的发源地，我们只能算第二拨，而第二拨对开创者很有些看不上眼。首先对“红卫兵”三个字就瞧不上——太嫩，太小儿科；再就是那一身行头，也就是后来著名的红卫兵式军装。不就是人家没有你们有，显摆什么？还戴上袖章，红红绿绿，盛装游行似的。所以我们四中就是不成立红卫兵，还照旧打着共青团的旗帜，尽管那时连团中央都不存在了。

四中校领导不是被学生打倒的，而是随运动的到来自动瘫痪，工作组进驻就交了权。不久工作组被撤回，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于是由几个高年级学生站出来，召集各班的学生代表开了个会，宣布成立联合团支部，以团代党，领导运动。完全是另一路。海淀区的红卫兵一直群龙无首，其中的活跃分子，像卜大华，牛皖平，骆小海，彭小蒙，张承志，陶正，都是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张承志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红卫兵”就是他命名的。可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头头。城区的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组织意识，八中以陈晓鲁为首，六中以董良翮为首，四中则产生了领导集体，为首的是孔丹，成员有秦晓、李三友、马凯、戴小明、周坚、赵胜利等，这三个学校成为城区红卫兵的主力。

红卫兵运动有很多过激的行动，比如抄家，“破四旧”，开批斗会，而在红卫兵高层，却有非常理智的核心。群众造反，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斗领导，二是抄档案，因为档案

中提供了可攻击他人的材料，这是各地档案大量失散的主要原因。而接管四中档案的是马凯，他看管得很紧。四中档案完整保存下来，马凯功不可没。后来李敖从台湾访母校，还找出当年的成绩单给他看。在一个疯狂的时代，简直是奇迹。

理智是人生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属于那些最优秀的人。而我在“文革”中不是理智派，凭冲动凭本能干事，犯了不少错误。要说那年头人人都犯错误，但人家错得不丑不混不烂，这就是品格。在“文革”中无论是谁，无论做什么，只要有品格，就令我深怀敬意。四中有个群众组织叫“新四中公社”，取巴黎公社之义，是我们对立面。其中有个同学叫杨小青，与我们积怨甚深，见面总是怒目而视。有一次外校武斗打进四中，我在混战中陷入重围，杨小青拼着性命把我救出来。但事后我们见了面还是怒目而视，而我心里一直都很敬重他，倒不是因为他救了我。

城区的红卫兵兴起后，势头一下子就盖过了海淀，“中央文革”整天催原创“红卫兵”去打倒刘少奇，他们磨磨蹭蹭，躲着闪着，死活也不上套儿。城区红卫兵却是一番气象，由四、六、八三个中学联合起来，成立了“西城纠察队”，是专管红卫兵的。李三友号称“李铁笔”，两个月中连写了十三道“通令”，口气大得不行，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抢文件，不许斗干部，不许这不许那，声动海内，各地批斗浪潮一时有所收敛。而中心思想就是要保住刘少奇。在这一两个月中，周总理办公室主任周荣鑫与“西纠”建立了联系，拨出专门的办公地点作“西纠”总部。董良翮和陈晓鲁成了“西纠”和总理之间的联系人。在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北京最混乱的期间，周总理通过“西纠”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第一个被打死的部长是煤炭部长张霖之，打手主要是煤炭学院学生，事发仓猝，令总理措手不及。不久冶金部长吕东又要被带到冶金学院批斗，一旦落到学生手里肯定没命。“西纠”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冶金部的干部随后赶到“西纠”。董良翮集结了一批队员待命，我校的袁塞路和国少庄也去了。后来他们跟我讲述了那天的情况，惊心动魄。“纠察队”只有十几个，面对数千群众，居然挡住那股洪流，对峙了整整一夜，群众才散去。

还有一件事很离奇。宗教学院的学生将香山碧云寺的佛牙掘了出来，扬言要砸碎，先开大会“批斗”佛牙。接到总理办公室的通知，“纠察队”正缺人手，于是值班的赵胜利只身前往。他赶到现场说明身份，群众与和尚居然让他将佛牙取走了。我问过赵胜利佛牙什么样，他说他也没看，装在一个纸盒子里，塞进书包带了回来，交给西城公安局。

更重要的是，陈晓鲁受周总理之托，前往海南岛筹办红卫兵农场，准备将北京红卫兵都送到那里种橡胶，这实际上也是文革的结束方式之一。我们都手舞足蹈，跃跃欲试，而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一些人就到越南和缅甸打仗去了。“西纠”的头头脑脑们，眼睛盯着总理，耳朵听着总理，猜测揣摩分析，力图跟上总理的思路。对四面楚歌的总理，手边有这么一股可左右形势的力量又是多么宝贵！

但后来“西纠”却在群众中留下恶劣的印象。除了以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的妖魔化外，我们自己也有严重的问题。先是唐双津他们的那些抄家，后是我编的那首烂歌，再有某些纠察队员不仅不管红卫兵，反而跟着一起折腾，直到纠察队员打死了人，事儿就闹大了。

先说说我的朋友唐双津，他为人大度豪爽，一身侠气。“文革”初期，他带着一帮同学把他邻居的家抄了。唐的父亲是共产党中将军，家住在景山后街米粮库，那邻居是旧将领世家，从前清到北洋到国民党杂牌军，三四代军人，最高军阶也是中将。这两个中将之家来自不同的阵营，但同为军人，多少总会有些英雄相惜吧。“文革”爆发不久，唐和谁都没打招呼，就把人家抄了。四中“革委会”挺着急，我忘了是孔丹还是秦晓，要不就是周坚，赶紧叫人去现场了解情况，于是我就去了。当时校革委会刚通过决议，绝对不许抄家，不许打人，不许武斗。

我赶到时，抄家已近尾声，唐双津谁的话都不听。他们正在审问那个老军人。十几个中学生把老军人绑起来，蒙了眼，让人家跪在地上。问着问着，老人的讲述把我们全都俘虏了，抄家的也不抄了，劝阻的也不劝了，全都挤在屋里听。老将军说起的往事，展现了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那是一个不眠之夜。老将军从跪着改为站着，从站着改为坐着，后来还有人端给他一杯茶。唐双津后来当了兵，在一九七五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我可不想夸大我的作用，但那歌还是难辞其咎的。说起来还是有点儿偶然。我校一个同学的哥哥在轻工学院被对立派围攻，我们赶去支援。当时这类争论很多，支持谁反对谁没什么理由，完全是瞎起哄。当时到底辩论什么连我们也没搞清，似乎并没有涉及出身问题，对立的两边不是以“红五类”和“黑五类”划分的。为了造声势，最好的办法就是先给对方扣个帽子，骂他们出身不好，混淆视听，先声夺人，这一招往往很奏效，让对方一下乱了阵脚。战略方针定下来，大家想找个歌到会场上造声势，一时找不到，就撺掇我瞎编一个。我连词带曲，一挥而就，大家还七改八改，有意弄得更难听些。谁也没料到，在会场上唱就轰动了。各路红卫兵不听辩论了，纷纷过来抄谱。那年头和现在一样，出洋相的玩意儿说不定就成了流行艺术。这首歌唱遍了全国。我到贵州“串联”，甚至还听过铜管乐队演奏。

这恶作剧的意外效果，让我既错愕又得意，到后来就不可笑了。批判“血统论”时，各路红卫兵追着我屁股后面打，把我从家里拎出来批斗。有一阵，连我也做好被枪毙的准备。据说江青说过这样的话：“他们不是有一个歌子吗？血统论，血统论啊！那个人坏透了，应该枪毙。”我听了吓得腿都软了。我甚至像阿Q那样想象自己上刑场时的表现，以免死得很没面子。后来没找到江青此话的出处，显然是人家吓唬我的。

一九六六年年底，我从外地“串联”回来，在“革委会”遇见秦晓，他满脸无奈地说：“你们搞的那个破玩意儿尽添乱，现在红卫兵彻底完了。”我惊问怎么回事，他说：“血统论呗，中央文革要批红卫兵了，现在我们什么事也做不成了。”不久就开始了红卫兵的清算，把“血统论”归罪于刘少奇。“血统论”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对红卫兵特别是“西纠”的清算，是因为我们自身的种种劣迹而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先把打死人的那几个纠察队员抓起来，紧接着是对“血统论”的公开批判，最后与刘少奇挂上钩，称之为“刘少奇的反动血统论”。

我们的丧钟就是这样敲响的。

红卫兵在溃散前完全失控了，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红卫兵的行头也是从那时开始变味的。当初穿军装是为了表示向解放军学习，可到了后来，帽子要呢子的，军装要料子的，鞋子要皮子的，什么三接头，将校呢，将军帽，成了时装秀。风气就这样败坏了。更甚的是，红卫兵和“西纠”中的很多人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又成立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理智派还想力挽狂澜，但已经没有人再听他们的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联动”选在毛主席生日那天举行成立大会。我去了，那是一个狂热的誓师大会。我校的李三友，戴小明和张小刚代表“西纠”发言，主张不管运动如何发展，都要首先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误。而大部分人作了相反的选择。北大附中有个我的初中同学叫项东平，原来是一个很腼腆的人，却成了“联动”的首领。“联动”的核心成员有“三平一刚”四人，他是“三平”之一。他指着正在发言的戴小明对我说：“你们学校是怎么搞的？江青连刘主席都要打倒了，还检讨我们的错误？我们没有错误，是毛主席犯了错误。我们要彻底批判毛主席的错误路线！”我吓坏了，这是我在“文革”中听到的最放肆也是最勇敢的言论，其实也正

是“联动”的内部口号之一。我知道红卫兵在劫难逃，那天开完大会我就溜号了。接着几千个“联动分子”去冲击公安部，被干警打得屁滚尿流，他们重新纠集，前后六次冲击公安部。

听说正是这事让老人家震怒了。于是从海淀的红卫兵到城区的“纠察队”，所有首领一网打尽，孔丹、董良翮、宫小吉等被抓了三百多。第二年，公安机关似乎又想起“血统论”，把我也抓进去。那时监狱已人满为患。

四中的政治氛围很奇特，总体来说，大家都很友善。四中的“黑帮子弟”太多了，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三兄弟，北京市长彭真的儿子傅洋、傅亮两兄弟，国家科委主任张劲夫的儿子张渤海，还有刘少奇主席的儿子刘源源。父辈被打成“黑帮”、“走资派”，甚至“叛徒”、“特务”，但大家还是朋友，没人歧视他们。刘少奇被打倒，清华的刘涛，师大一附中的刘平平都受到迫害，只有刘源源在四中平安无事，不但我们待他好，对立派的同学，还有“革委会”、工作组、“军宣队”、“工宣队”，都没对他怎么样。

马凯在四中的身份有点儿特殊。他应在前一届毕业，保送北大，但因生病休学一年，留在四中做团的工作，正好赶上文化革命。在我们这些刚考进四中的新同学看来，他是老师，当然也就是造反对象，但在老同学眼中，他还是学生。他处在这么一个尴尬的位置。我们贴过他的大字报——谁让他是校团委的工作人员呢？后来他被高年级同学选进革委会，让我们莫名其妙：这老师怎么也成了红卫兵？马凯不善言辞，性格内向，偏偏又坚持原则，一急满鼻子的雀斑就会红起来。

马凯常常被我们捉弄。一些同学去查抄档案室，马凯挡在门口不让进，我们就贴了他的大字报。后来在“血统论”的辩论会上，我们就故意臭他，要他表态，他先是不肯，后来逼急了，涨红脸说：“同学们，我坚决不能同意你们这个口号！”我们哄堂大笑。其实早就知道他的立场，其实孔丹、秦晓和周坚这些头头们也都不赞成“血统论”，不想招惹他们，但马凯就不一样了，他有教师背景。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

我初中上八一学校，高中考进四中。这两所学校毫无可比性，四中号称天下第一中，八一学校现在只是个三流中学。其实就教学方面讲，四中的资源并不比八一强多少，也不比其他学校强多少。四中的老师也一直告诉我们，四中无论师资还是设置并无特别之处，关键是高质量的生源。八一学校是干部子弟学校，固定单一的生源，决定了一般化的教学质量。我在八一学校是优等生，但考进四中就吃不消了。四中的学生个个全都聪明得成了精，老师讲课不用费劲，课本内容往往简略带过，高兴了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我哪儿见过这阵势？眼见着就跟不上了。第一学期我是团支书，班长是曲明光，第二学期曲明光离任，我当上班长，王来强担任团支书——原因很简单，曲明光的成绩掉下来。其实我的成绩更不灵，但田佣老师似乎很看重我干事的那股劲头，舍不得罢免我，但我相信，到了高二，就是他不罢免我，我也得自己请辞——成绩一落千丈，根本顾不上班里的工作。我们班同学你追我赶，成绩最好的都不是班干部。在我印象中，最拔尖的似乎是李大成和季如迅。李大

成平时不哼不哈，每到测验和考试必定是满分；季如迅是个大活宝，整天嘻嘻哈哈，尽说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再就是朱之鑫，此人做事极有章法，风格洗练。有件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在一次化学试验中，我们配制一种叫乐果的农药，要心灵手巧，用滴管滴得极均匀才能完全溶解，稍有差错就会有沉淀物，最后全班只有三四个人做了出来。老师举起朱之鑫的试管对大家说：“多漂亮，香槟酒一般！”我才头一次知道香槟酒的颜色。我自信是个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可那天我的试管里一片浓雾，让我丧气透了。

班上还有一些知识型的同学，也是我在八一学校从未见过的。曹一凡最有意思，他满嘴讲的都是一些知识含量极高的笑话，在我眼中，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狡猾的教授，有些笑话，答案得到大学课本去找。“文革”中，他告诉过我一个对联：“曲率半径处处相等，磨擦系数点点为零”，谜底是“又圆又滑”。那是他从大学里的大字报上看来的。

这一切让我得出结论：我在这里和人家根本无法相比。我还怎么当班干部呢？这纯粹是靠天份，而不是靠努力。我看出四中教育的症结就是竞争，这是应试教育的根本，优胜劣汰，天经地义。这是我在八一学校体会不到的。

那时在共产党干部中，就已经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他们的子女在学习上远远不及“资产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们，那么将来由谁“接班”呢？这在六十年代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接班人”的问题。《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首歌就是那时候唱起来的，一直唱到今天。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让我们这些干部子弟将来“接班”，八一学校想出个办法，组织同学互相帮助，让优秀生带动落后生，提出的口号是“像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一样抢救学习落后的同学”，掀起一股学习热潮，那年八一学校几乎全数考上高中，有相当大的比例考进重点高中。但考进去的往往都感到巨大的压力，自然包括我在内。

四中的学生成份结构中，有很多干部子弟，但严格说，这里主要集中了干部子弟中的精英；另一方面，也集中另一类精英，就是曾被我们认为是“异己”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包括朱之鑫在内。党要求我们把他们比下去，我们按党的要求努力了——可见我们当时的思想有多么狭隘、扭曲。

四中的学生成份确实很复杂。我们在“文革”中曾认真统计过同学的家庭出身。奇怪的是，同学们都争着往坏里报。这几乎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高干子弟，不报“高干”报“革干”；“知识分子”子弟报“高级知识分子”（简称“高知”），因为“高级知识分子”比普通知识分子的名声要“坏”。象陈凯歌他们就要报“高知”，只报“知识分子”似乎有隐瞒之嫌。当时四中的学生成分中号称五“高”，即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高级职员和高级资本家，外加高级民主人士。“民主人士”的地位很特别，很多人都受到冲击，他们的孩子也就往“坏”里报。四中有个出身统计表，同学们“踊跃登记”，五花八门，什么名目都有一一有填“军阀”的，大概是起义将领。还有一个填“奴隶主”的，简直就象是从数千年的坟墓里蹦出来的，后来才知道是阿沛阿旺·晋美的儿子。阿沛阿旺·晋美当时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过去是西藏的领主，这么填也没错。

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

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

后来四中校庆我们纷纷回到母校，校长和老师们见到同学们第一句话就是：你们在“文革”中都表现得不错，对老师很好，从来也没批斗过老师，更没打过老师。杨滨校长已去世，原副校长刘铁岭当了校长，他见一个同学这么说一句。其他老师也跟约好了似的，一见面也是这句话。原教导主任赵济敏老师，和我根本不熟，见到我紧紧握手说：你表现得也不错，你还保护了老师。

我保护了老师？这才见鬼呢。四中开批斗大会，我虽不在现场，但我谁也没保护过，连班主任田侑老师我没有保护过，我只是没顾得上批斗他而已。赵济敏老师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在统一口径——那些往事谁也不许再提了，老师们都忘了，你们还记着干什么，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干嘛这样编假话说给大家听呢？看来文化革命实在是说不清楚，那就干脆什么都别说了。

其实四中和所有学校一样，也有过大规模的批斗，杨滨和刘铁岭两位校长就都给泼了满头满脸的墨汁，赵济敏那时还是年轻教师，算是他们的“黑干将”，跟在后面。有人做了个大木枷，套在他们头上。周坚快气疯了，黑着脸叫人拿下来。那次批斗会打得杨滨腰都直不起来了，还是赵胜利扶她下的台。我们怎么没有批斗过他们呢？但四中的老师，不仅没秋后算账，反而设法把学生保护起来。

不过话说回来，历史也有报应。我参军后，我们部队接到一封外调函，说我在“文革”中带着众多红卫兵抄了李莲英的孙子的家，有一批珠宝和字画下落不明。

这就是那个慈禧太后的太太监李莲英，他有过继儿子，自然也就有孙子。我在“文革”中从未抄过家，那外调函上的地址刘兰塑胡同就在四中旁边，我隐约记得去过那地方。这下可把我难住了。人们对“打砸抢”的红卫兵印象极坏，尤其是在部队。可我百口莫辩，只好自认倒霉。和所有年轻人一样，我当兵后雄心勃勃，入伍不到一年就入了党。可外调函差不多把我的前程全给毁了。当时我在北海舰队航空兵报道组，组长刘桂枫是个很有思想也很有性格的人。他观察了我一阵，似乎看出我的困惑，于是给了我一次出差机会，让我“顺便”核实一下。他说：“是你的你就认错，不是你的就说清楚。”

我回到北京，找到刘兰塑胡同的那个小院，一眼就认出来，说明我确实来过。我敲开门，主人是中学教师。我向他说明来意，他顿时眼中充满敌意，说他手里有证据。我请他拿出证据来。他取出一张纸，上面的确是我的笔迹，但看过后我快炸了。那上面分明写着：各路红卫兵，这家虽出身不好，但某某是人民教师，并得到过政府奖励，请不要查抄。下面是四中红卫兵的大印和我的签字。

我这才想起前因后果。六六年“红八月”，此人拿着他的奖状到四中请求保护。当时掌管大印的徐东熙正接待来访者，就让我去看一下，于是我陪着他转了一圈，给他开了这张证明。这是以我的名义保护他的证明，并不是抄家的收据，反倒恩将仇报。现在回忆起来他也有他的道理：在他看来，所有红卫兵都是一回事。他是红卫兵的受害者，红卫兵就都是他的仇人。这就是历史的报应，凡报应总得有人来承受。

在“文革”中，学生保护老师的例子也不少，但往往需要某些条件，比如当时冲击较小的军界干部子弟，象徐向前元帅的儿子徐小岩，张爱萍上将的儿子张品，杨成武上将的儿子杨东

明，张国华上将的儿子张小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四中的薄熙来和薄熙成，身在困境中帮助过老师。他们的父亲薄一波被打倒，他们从中南海搬到一个小地方。在那里他们保护过老师，特别是他们在实验二小的老师霍懋征，这位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曾是他们的班主任。我在杂志社工作时拜访过霍懋征，当我提起认识薄家兄弟时，她动情地说，在“文革”最混乱的时期，他们兄弟曾把她藏在自己家里。

我要为中国的红卫兵说句公道话。红卫兵有过非常过激的暴力行径，这是错的。但是我们看看当今的世界，看看那些群众性暴行，相比之下，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可以说是够克制、够文明的。红卫兵打人有很多因素，毛主席以及江青、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纵容甚至怂恿起了很大作用。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什么“要武”，什么“红色恐怖”，都有过“最高指示”。六六年的八九月武斗成风时，军事院校群众代表就该不该打人问林彪，林彪还说：“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坏人活该”。虽然“十六条”也有不许打人，不许武斗的条文。这在最高层本身就是一笔糊涂帐。这么说不是在推卸我们红卫兵的责任，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看看红卫兵的武斗给世界革命带来的影响，象日本的“赤军”、意大利的“红色旅”，拉美的“光辉道路”，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缅甸根据地的文化革命等，就知道这意义是多么不同寻常了。红卫兵的武斗绝不仅仅是简单的暴行，它在上个世纪中期，特别是整个六十年代，在全世界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离开世界革命的背景，特别是离开世界暴力革命的背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允许红卫兵的暴力是很难解释的。

另外对于红卫兵来说，这里还有一个演出脚本的问题。我们这代人都是看革命电影长大的，和上一代人的革命比起来，我们这代人的“革命”有着很强的模仿性。在我们最熟悉的镜头中，当黄世仁、南霸天、胡汉三等反动角色被押出来，群众不都是涌上前去挥动拳头么？这就是群众运动的仪式。而在这些电影中，当群众纷纷挥动拳头，有红军、八路军或者民兵在维持秩序，但在“文革”中，这一角色却缺席了。武斗的失控由此而来，直到打一个死一个，中央还不控制，这就不那么简单了。红卫兵成立“纠察队”，最初就是想扮演红军、八路军的角色，但又存在着悖论：归根结底，红军和八路军是更加暴力的武装力量，战绩使他们拥有维持秩序的权力，那么“纠察队”的战绩在哪儿？普通红卫兵又凭什么要服从他们呢？在这个意义上，孔丹他们成立“纠察队”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四中的红卫兵，连同三个中学甚至西城的红卫兵就跟着他们走了，当然是只走了一段路。但这把火炬还是被上面无情扑灭了，孔丹的母亲甚至为此招来杀身之祸。

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有一次，我们押送一批“牛鬼蛇神”去批斗。其中有个老叛徒，好象是因彭真作保才没被枪毙，也是作为彭真的罪证拉去批斗的。这些人一上车，我们就开打。那个叛徒够老的，跪在卡车上，屁股撅得老高，露着裆。就怕有人往那里踢一脚，要了老家伙的命，我一脚插在他两腿中间，护住他的命根子，这样我离他最近，气不打一处来，拳打脚踢，把他们打得够呛，进会场时，一个个东倒西歪，群众中有人高喊：不许武斗！要说我们确实不像话。押解犯人应维持秩序才对，自己倒先动手打起人来，触犯众怒。

离开会场后，因受到群众的指责，那几个红卫兵心里窝着邪火。那是下半夜，街上空无一人，卡车在红灯前停下。有个过路人推着自行车凑过来往车上看，还问这问那，被这帮红卫兵叫上了车，一顿臭揍。那人被打蒙了，索性扬起脸，让他们打，直到满脸是血还那么挺着。那几个家伙毫无恻隐之心，直到打累了，才把他踢下车，又把自行车砸在他身上。在他们的叫骂声中，那人一瘸一拐推着车走了。那是一个普通过路人，很天真也很善良，我直到现在还能想起他的眼神——困惑、绝望、听天由命。

这几个红卫兵都是外校的高干子弟，心肠之冷，下手之狠，操控他人生命于股掌之间。这完全是禽兽行径。而我也深感羞愧——我和其他在场的人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甚至生出一丝恐惧，怕他们掉过头来把我们也暴打一顿。这件事一直让我很窝火，后来我和某些军队高干子弟之间也发生了激烈冲突，打得天昏地暗。

还有一种人就是鬼魅，这才是群众中最可怕的角色。我们班有个同学叫栗钧，平时不太爱说话，老实本份。当时校内满是串联的学生，不知他说了句什么话，被团团围住。我们班的李惠敏跑过来说：“栗钧出事了！”因为我是我们班红卫兵头头。待我赶了过去，栗钧已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不省人事。这事的原委我一直没搞清楚。我根本不懂抢救知识，和大家一起把他拖到水管前擦洗，先看伤在哪里。其实这是很危险的。人群又围了上来，我们只好再把他拖到宿舍。这时有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挤过来，手握尖利石头，朝着栗钧的眼睛戳下去。当时根本腾不出手来制止，我只是瞪了他一眼，他收回手，转眼消失在人群中。这样的男孩就是鬼魅——势单力薄，来无影去无踪，得手便走，倏忽即逝，在混乱中甚至很难发现他们的身影，但历史中最深的创伤却往往就是他们留下的：钢琴家刘诗昆的手指被折断，新风霞差点儿被破相，与其说是群众，不如说是混在群众中的鬼魅造成的。杨丽坤的精神病主要来自幻听，那是受到恶言恶语的刺激。能讲出如此恶毒语言的，这就只能是鬼魅了。

如今我们这些“老红卫兵”说起往事，大事就那么五六件：一九六六年五、六月，反教育体制反工作组，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就是这时写的，这是我们的躁动期：七月，停课“大批判”，主要由学校组织跟着报纸批“三家村”和“海瑞罢官”，让我们很不耐烦；八月上旬，毛主席的信透露出来，纷纷成立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八月下旬，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造反规模扩大并失控，开始抄家，批斗中出现打人现象，“纠察队”为整顿秩序应运而生；九月，似乎折腾够了，红卫兵运动突然沉寂下来，却与社会上的流氓发生冲突。火力全部集中在流氓身上，这才是真正血肉横飞的时刻。这些流氓是由当地派出所协助抓获的，有案可稽。各学校一时人满为患。四中抓了二三十个，关在一个小院里。我自然也参与了。这恐怕在人类社会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大约半个月內，北京红卫兵扫荡全城，大打出手，倾泄我们无情的暴力。北京城里究竟打死多少龌龊之辈，谁也不知道。红卫兵的暴力主要是为人熟知的皮带，这是唯一的刑具，从未使用其他手段。在这方面，中国红卫兵是很缺乏想象力的。

如果记忆准确的话，我只打过一个流氓，那是我对他母亲的承诺。这个流氓从家中被抓时，他的父母追出来，又打又骂又踢又啐，央求我们狠狠打，好将这个逆子教育过来。尤其是那父亲咬牙切齿，恨不得有人把这个儿子打死。但临押上车时，他母亲悄悄拉住我的手央求说：“别打坏就成！”我的心一下子就碎了：我没有从我母亲那里得到过这样的母爱。我打人时手很重，特别是听到那些罪行时。我履行了对那母亲的承诺。我每天都要打一顿那个流氓，不让别人染指，每次都转述他母亲的央求。我心存幻想——为一个母亲让浪子回头，但除了虚伪的告饶和对父母的怨恨，一无所获。我抽他抽到连手都抬不起来了。假设给你一根皮带，让你每天抽同一棵树，没几天你就会累趴下。当时四中也打死了个流氓，死因不明。其余的均无重伤，只是皮开肉绽而已。中国毕竟不培养职业打手。

十月，红卫兵陆续离开北京去“串联”；十一月，由于对打倒刘少奇的极力抵制，被毛主席一脚踢开。

“造反”、“破四旧”、“抄家”和“打流氓”这四件大事，构成红卫兵运动的高潮，贯穿始终的是“鼓吹血统论”和“死保刘少奇”这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主题。红卫兵运动以“冲击公安部”事件告终，此后一直处在被历史清算的地位上。这构成了北京红卫兵历史的基本脉络。

□ 引自网站《今天·今天论坛》

~~~~~  
【当事者说】

回味“九一三”

• 程 光 •

〔按：本篇摘自程光著《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一书。文中的父即父亲邱会作，子即儿子程光（邱承光）。〕

父：1972年5月初向我宣布了审查意见以后，到76年年底，近五年时间里无人问津，我只能苦闷地消磨日子，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子：那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几年。毛泽东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一浪一浪接连而来，上至国家总理周恩来，下至普通平民百姓，无数的人被卷进政治漩涡，遭到批判和整肃。

父：紧张的提审突然停下来，开始我还不适应，脑子里想的东西特别多，时间一久，就理出头绪了。当然，我反复思索的还是“九一三事件”。

子：“九一三”很复杂，你主要考虑些什么？

父：林彪是否有谋害毛主席和阴谋武装政变是“九一三”的核心。

子：这两件事被官方说成是“两谋”。

父：我考虑了很多，现在也还时常想，“两谋”令人难以置信呀！我提出的证据和理由很多：

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毛主席年近八十岁，身体不好，亲自视事最多不过几年，外人对此不知，林彪完全了解，他有必要那么急不可待吗？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子：还有周恩来总理在北京。

父：对这个我就不予评论了。什么张春桥、姚文元呀，用几个警卫员就够了。当然，林彪若这样做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但总比武装政变的风险小多了。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

指挥解放军有程序，只要一动，我们就会知道，可是没见到林彪一点动静。

子：指挥军队的程序，难道绕不过去吗？

父：绝对不可逾越。细节就不说了，那是国家机密。要政变，不找军委办事组“办事”根本不可能！把1969年军委下达的预防苏军突袭的战备“一号令”说成是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预演”。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政变是隐蔽性、突发性极强的行动。古今中外，从来没有政变前还要“预演”一下，事先打“广告”的。连这种事也列作林彪政变的主要证据，岂不成了笑话。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利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我根本不知道有武装政变，林彪没有通知我，也没有任何人通知我做好行动的后勤保障和武器准备。黄永胜也没有通知任何部队做准备。政变不是一两个人可以搞得了的呀！手里没有部队，没有周密的组织指挥，搞什么政变？那不是胡扯？林彪会放着军委办事

组不用，反而让林立果找来几个毫无军事指挥常识的空军机关政工人员和秘书去搞政变，那不是胡闹吗？林彪是个打仗、办事无充分把握不行动的人，他能不顾一切地做出如此荒唐之举吗？

第五，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9月12日是“政变”关键的日子吧？那是个星期天，黄、吴、李和我被说成政变的关键人物，都在家中休息，像是要政变的样子吗？我知道林彪从北戴河走了，是13日早上听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除了北戴河林彪那儿发生的事，全国都很平静，没有响过枪，没有部队动，哪里像是发生过了武装政变啊？！如果发生了，总会有或大或小的军事行动吧！可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第六，事后也没有政变流产的骚动。9月13日后十天里，各地的军情公文是呈军委办事组报中央的，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部队相关的报告，就像没那回事儿一样。9月14日，我们根据中央指示，下令陆军管制空军。全国所有的机场，陆军都住入一个连或营。不是说空军参加武装政变了吗？还说有什么使用轰炸机之类的事！但是他们受到陆军的管制，也是乖乖的！没有任何反应嘛！

子：中央公布的材料说，林彪是武装政变失败后外逃的，否则为什么跑呢？说他“政变”失败后外逃，似乎是合乎逻辑的推导。

父：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负责任。这么定罪，会害多少人啊！

既然说到这儿，那我就再说第七个不可能有“两谋”的考虑，指责林彪武装政变失败后才“外逃”，不能那样推导。

林彪真要“外逃”，应该早于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那才合乎逻辑，但相反，他“外逃”恰恰晚于毛主席回到北京十几个钟头。

面对毛主席南巡中咄咄逼人先发制人，林彪可以找到出路。林彪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一定要出走？我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毛主席和林彪的分歧是什么？以前说林彪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给林彪定的罪名反而说他要搞文化大革命。真若如此，那么毛、林之间就没有根本分歧了，那么说，不就前后自相矛盾了嘛！退一万步讲，即使林彪怕别人抓他什么把柄，也不需要出走，积极的出路是和毛谈一谈，消极的就是一言不发呆在那儿，看毛怎么办。林彪和苏联毫无关系，也没有任何联系，可能贸然行动吗？即使他萌发了出走之心，之前下几个命令，使国家乱上一阵，可以起到掩护作用，可是林彪并没有那么做。

第八，也是很重要的理由，至今我没有看到公布任何真凭实据的武装政变证据。从1971年到1981年公审，是十年，到现在，又二十年过去了，都三十年了，我没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材料。如果有，那可是打林彪的“原子弹”，对他是致命打击呀！当年中央下发的文件，说林彪提议设国家主席是“反动政治纲领”，是为政变服务的，这也算“证据”？完全不能成立嘛！

以上那些道理，我都能想明白，毛主席、周恩来那么聪明睿智，经历过那么多沧桑世故，对林彪又那么了解，他们就更明白了。

子：你提出八条理由，很有说服力。

我再为你补充一个理由，“九一三”后，林彪、叶群，黄、吴、李、邱身边工作人员被拘留审查的数百人，都表示响应中央号召和林彪划清界线，要深入揭发，然而，却没有一个人揭出有“政变”的事。那么多人在林彪和你们身边，总会看出蛛丝马迹吧？可是一点也没有。专案组叫黄永胜的警卫员费四金揭发“九一三”事发前的晚上，黄永胜曾于“九一三”前一天在北京和林立果见过面。

父：是小费呀，他可是和黄永胜寸步不离的警卫参谋，有什么事他最清楚。

子：哪怕是纪登奎亲自审讯“动员”，小费也说没有那回事儿。只要他说“有”，后半生会荣华富贵，否则就要倒霉一生了。可是他坚持说，没有那回事儿！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林彪的警卫处长李文普揭发，林彪上了汽车后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它被作为林彪有预谋地外逃的证据。我听和李文普一起受审查的人说，是他得到中央承诺对其保留军籍和待遇等条件后才那么说的。

父：林彪不知道伊尔库茨克在哪儿？笑话！我们办公地方挂的大幅地图上明确地标志着，那里是苏军远东军事指挥中枢，林彪经常考虑的就是那儿，交待我们防止苏军突袭，关注的就是那儿。林彪会问李文普那个话吗？

再说只有李文普一个人那样“揭发”，李有贴身保卫林彪的责任，可是他“玩忽职守”了。他那么说，有推卸责任的动机……

子：我向法学专家请教，这在法律上被称作“污点证人”。李文普被关押多时之后才说，且与他本人利益相关，又是死无对证的“孤证”，从法理上讲，不应被采信。

说到这儿我想，别人会不会认为你也是利益相关者，才说出以上那些理由？

父：我敢说我就敢负责。我不能说我说的百分之百都正确，可能有说误的，包括以前和你说的“九一三事件”，特别是时间、地点、人名字，可能有记错说错的。如果有，我负责。但是事件大的方面我没说错，专案组翻箱倒柜也找不出来我有意捏造的嘛。

我是实事求是，对事不对人，不偏袒毛主席，也不偏袒林彪，面对历史说话。我对林彪的错误，毫不遮掩，对毛主席的错误，也毫不保留。但我不反对他，不骂他呀！我不反毛泽东！

子：中央指责你们，说在这场毛泽东和林彪的斗争中，你们站在了林一边，违反了毛泽东的意志。

父：那可是冤枉我们了。我不否认我们是拥护林彪的，但我们是根据毛主席对林彪的重用而拥护他的。我们中央红军出身的干部历来都听毛泽东的！过去，毛泽东相信朱德，和他合伙干，那我们就拥护朱德；以后他把朱德摆在一边，用彭德怀了，我们拥护彭德怀，听他的指挥；后来，毛泽东又不相信彭德怀了，把他打倒，用林彪了，我们听毛主席的，拥护林彪，跟着他干工作。如果毛主席不把林彪当成“接班人”、“亲密战友”，我们又怎么去拥护他呢？我对林彪的拥护同毛主席对他的重用是一致的。再说，我的拥护是有条件的，就是林彪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拥护他。如果他不拥护党中央毛主席了，我也就不拥护他了。

子：如果之前林彪和毛泽东公开反目了，你会站在哪边？

父：我从来没有想过背叛党，背叛毛主席。

子：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为你们定“政变”罪呢？其它罪名也可以把你们打倒嘛。

父：毛主席为我们定这个“罪”，是为了能随心所欲地处理林彪问题。把我们关起来，不是依法处理，而是要用“活人”的口供证实林彪“弥天大罪”的存在，毛主席就好名正言顺地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我们几个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那林彪不就罪该万死了！毛主席听到林彪的死讯后不是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吗？他心里完全明白呀！不为林彪定这个罪，毛主席就没办法推卸自己好多事了，对人民和历史就不好交待了嘛！

子：也就是说，这和毛泽东为刘少奇定“叛徒、内奸、工贼”的道理一样，如果不那样为刘定罪名，就不好处理他了。

父：是这个理，但还有更多的内涵，如果不为林彪定这个罪，岂不是说林彪就是被毛主席逼走的，那可不得了啦！还有，毛主席和林彪历史上的关系那么久，那么密切，如何解释？不定这个罪，那就不能自圆其说了嘛！

到了这一步，对“九一三”已经不是要搞清事件本身的真相了，而是各派政治人物都在利用这个“政治素材”做文章。毛主席用它来做“林彪帮一个大忙”的文章，周恩来用它来做“划清界限”的文章，上海帮用它来做“争取成为接班人”的文章，汪东兴们用它来做“掩饰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用它来做“东山再起”的文章……对“九一三”的审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办的事了，必需有一个“反革命政变”，才能让各方的不同政治需要能够实现。

子：作为政治家，他们那样作，不失为一个应急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

父：林彪死了，无法说话了，我们又被封了口，这种手段在一定时间内是起作用的。但是，假的总是假的，特别是我们这一批人还活着，是懂得内幕的人嘛！相关的证据也不可能全部毁掉吧！总有存留下来的嘛，否则封锁得那么死干什么？所以，用隐瞒手段不能长期起作用，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

子：中央专案组在“两谋”上的认定，没有直接抓林彪，抓的是林立果。

父：林立果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获释后才在中央发的材料里，在社会流行的书刊上看到，林立果和几个心腹发泄过对毛的不满，有的话很露骨。

子：抓住了林立果的那几句话，可以为林彪定罪吗？

父：还是要用事实说话呀，只凭别人揭发的林立果的那些话，就为林彪定罪，恐怕不行吧！那时社会上就有私下议论和诽谤毛主席的事，我从公安的内控报告上知道，是一种社会现象嘛。何况那又不是林彪本人的，林立果的话也是事后从在押人犯嘴里搞出来的口供，还是孤证。那些人嘴上说说，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是两回事。

退一步讲，林彪同他的家人是否搞了什么名堂，我不清楚。我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中央专案组抓的“把柄”，那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暗中搞的贼路鼠道的名堂。要是林彪在指示他们搞，或是知道他们搞，从现在公布的材料看，我看没有什么说服力。

子：林立衡说，毛泽东自庐山会议后整林彪，整解放军，林立果不满。他曾和心腹的几人关起门来议论，只是自说自话和乱涂写几句而已，形同儿戏，一出房间就没那回事儿了。何况，他们的这种议论话，对林彪是绝对保密的。

父：犯罪主要是看行动，而不是看你怎么想。

子：到目前为止，国内对“九一三”的研究，只是在间接情节，在涉嫌小事上考虑，甚至拿个别人在事发很久后“交代”出来的“孤证”定案。而没有从大局上，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错误路线政策的根本原因上去考虑，结果只能是“剪不断，理更乱”。

父：现在人们说的多是“九一三”的表面过程，背后的东西还没有亮出来。

子：可是林彪走了是事实。林彪这一走，事情就复杂化了，被说成是“叛国投敌”。

父：按照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是在林彪“外逃”前十几个小时回到北京的。如果毛主席要是知道林彪要“外逃”，十个林彪也跑不了啊！

林彪究竟是怎么走的，先不管他。但无论如何，他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的。林彪要同毛主席面谈，毛不接受，反而在南巡中讲了一路，杀气腾腾。林彪怎么办？找毛主席谈不行，别的办法一时又没有，总得找条活路吧？应当说，林彪是毛主席逼走的，没有毛主席南巡谈话发难，就不会有林彪的出走。

子：有历史学家认为，是毛泽东引起了“九一三事件”，甚至是制造了“九一三事件”，实质上毛泽东整垮彭德怀、刘少奇一样。彭德怀对毛泽东是申辩反驳，刘少奇是和平主义反抗，而林彪是离开避祸。

当然，也有一种议论，任你毛泽东逼，林彪要是不走，就不会那样了。

父：那是一个假设。但我认为，毛主席对林彪，不是林彪检讨不检讨，走不走的问题，而是毛主席的思想意识问题，他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批陈整风”会议前，毛主席不只一次说问题已经处理完了。还不到四个月，他反悔了，开始南巡，逼出了“九一三”，这就是毛泽东啊！

我再强调，毛主席对林彪，简单来说是他“要不要林彪”的问题。他要林彪，是一种处理办法，不要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主要矛盾在毛主席方面。

子：迄今中国没有公布“九一三”案情原始材料。甚至规定，相关材料一律绝密，不受《保密法》三十年后解冻的约束，轻易不许外人查阅，如一定要看，须经中央批准……我想，对这些材料一反常规不许披露，肯定它是不支持官方的立场和观点的，否则早就公布了，那样就把林彪“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平息了不绝于耳的非议。

父：指责我们参与政变，也没拿出证据，如果有，那也是一颗“原子弹”，威力大呀！把我们参与政变揭穿了，林彪的罪也就定了，可就是不见他们拿出来。

子：“九一三”后，中央专案组派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进驻林彪的家，把每一个纸片，每一个线头，都翻过了。对黄、吴、李、邱等人的办公室和家也反复地仔细清查了，居然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政变痕迹。他们对我们家搜查，把棉衣的里子拆开看，皮箱的衬布撕下查；把小妹妹的作业本、我的大学课本、笔记本，都一页一页地编号，查过后盖上“验乞”的专案组公章，真可谓一针一线一纸一物都不放过。

父：从侦察学来说，这就是没有证据。因为你只要犯了罪，就会留下痕迹，更不用说谋害毛主席这样大的事了。

子：专案组从林彪家找出一些学习卡片，当作政变的证据，说什么林彪“尊孔尊儒”，提倡“克

己复礼”。更有甚者，中共中央还转发了个《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孔孟思想的继承者，让人民把孔子思想当作“反革命”的源头批判。

除了批判林彪的思想外，还对他的历史进行清算，说他反对毛泽东，可以追溯到二十年代井冈山斗争和红军长征途中，以证明林彪的“两谋”是历史的必然。

父：专案审查，过多地在林彪的思想见解和历史问题上搞，是对现实问题缺乏证据的无奈！要说毛泽东一开始就和林彪进行斗争，根本不是那个历史。我很早就亲身感受了毛主席和林彪非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1935年遵义会议后，我调任中央军委四局三科科长，管中央纵队的军务行政和生活保障，就和毛主席在一起了。我们四渡赤水，过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经历了长征中最艰苦的一段。我到职后发现，红一军团长林彪经常给毛主席送吃的用的东西和战利品，科里的人对我说，长久以来林彪一直那样作。红军过草地之前，林彪派他的管理员牵上他自己骑的驯良的骡子给毛主席用。毛主席不善骑马，一直没有合意的牲口，那林彪就解决了他的难处嘛！林彪还派了八名身强体壮、政治可靠的战士为毛主席抬担架，他想得多周到！我到红一军团二师把他们领回中央纵队时，二师师长陈光，政委刘亚楼代表林彪送给毛主席二十几斤青稞面的干饼子和十几斤牦牛肉干，那可是珍贵的东西。他们说，林军团长交待，只能给毛主席用。那时毛泽东不是最高领导人，在他之上或差不多的还有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好几个嘛，可是林彪关心的就是毛泽东。后来，中央纵队在草地上遭敌人骑兵袭击，到了陕北铁边城又被敌人冲散遇了险，都是林彪派的那个担架班抬着毛主席跑，才脱险！

说的再早些，在江西时毛泽东受王明路线打击，生了大病，心情非常压抑。在毛主席人生最不得意，很少被人理睬的时候，林彪对他一往情深，暗中保护着他。那些是我听说的，而长征中的事，我亲眼所见。现在为了把“军事政变”说得像那么回事，就把毛泽东和林彪亲密的历史关系说成是激烈斗争的样子，扯谎！

子：有的材料被销毁或灭失了，但中央文档里还存留一些。许多研究这段历史的学者，虽然受纪律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有人看过一些原始资料后，对我说，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事是怎么搞出来的，无需你们去辩解，只要把档案公布就真相大白了。在毛泽东和党犯了长达十年的全局性路线错误的历史条件下，让在军队一线主持具体工作三年多的黄、吴、李、邱个人去承担那么多责任，有失公允。

父：既然拿不出证据，那就把你搞“臭”吧！总后勤部在我们家里搞了个丑化我的“展览会”，影响很大。周恩来闻讯后，派王洪文去看了一下。周恩来听取汇报以后说，在高级干部家里办展览会，过去没有过，是个新创造。对犯错误的人为什么总要“算老账”、“挖祖坟”？添建的房子质量高了一点，那是作为总后战时临时指挥所建的。国务院、军委和各省市都建了这样的房子，大家都在里面住着，拿邱某住的办展览，不是对其他人的挖苦吗？周下令展览立即停下来，说“脑子发热，总是办不好事的。”

子：我仔细梳理了一遍，要说“九一三”直接涉及到你们的“物证”，只有那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信，或许它是对你们实事求是的一个障碍。

父：当时在人民大会堂政治局会上展示那封信，我就对它怀疑，除了字迹以外，也不符合林彪的办事风格嘛。林彪和黄永胜有事，都是面商或是由机要人员转达。林彪从来没给黄永胜写过个人的信，为什么这么关键的事上，莫名其妙地写上了那一封含糊不清的信？

子：那封信和从周宇驰那儿搜查出来的字条，是当作林彪下达政变的“手令”，说什么“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有学者质疑，“盼”和“命令”两个用词很矛盾。既然是“命令”，就必须绝对执行。军事科学院保存着林彪所写的大量命令，从来没有说过“盼”的。何况同样内容的“林彪手令”居然有两个，一个字是横着写的，一个是竖着写的。

父：那你还能说它是真的？！

子：为林彪定性为反革命政变，有一个关键的证据是《五七一工程纪要》，它的名字用了“武装起义”的谐音。

父：之前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1981年我出来后，看到了，觉得以它为主要证据，蹊

晓的地方很多。

子：它是以影印件的形式在全国公布。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部队传达以后，批判林彪的运动就如排山倒海之势。《五七一工程纪要》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大胆地否定了毛泽东不健康的东西，也否定了当时许多错误政策。它针对文化大革命推行的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政策，如学生上山下乡、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知识分子遭受打击、党内残酷斗争、社会阶级矛盾激化等问题进行了鲜明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纪要》里说的这些都在改革开放的头几年里解决了。

“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在描述林彪的书中，凡提及、引用、附录《纪要》的，都把它对文化大革命批判的内容删掉了。只是把里面要除掉上海帮“兵谏”毛泽东的设想，当作了反革命政变的证据。

父：在我看来，那不像是久经沙场的林彪所言，反倒是像没有指挥过军队的狂妄书生写的东西。

在政治生活中，在共产党内采用暴力手段，我不同意。毛泽东是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的领袖，他开创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是他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这面旗帜不能砍倒，尽管他不公正地对待了我和其他许多人，思想中有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尽管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子：毛泽东的错误是那个时代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意识造成的，但他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历史面前，人们可以指点评论。

父：《五七一工程纪要》不是林彪的手迹，也不是林立果、叶群的手迹，栽在林彪头上缺乏法律根据。仅从《纪要》的思想和文字风格上看，我说那绝不是林彪的。林彪的思想是中国式的、传统的，他的语言比较“土”，实在、古板，甚至有些涩口。

子：《纪要》完全是西式的，现代的，词藻华丽、流畅，情绪化的东西很多。

父：熟悉林彪的人看了那个《纪要》，都不会说它是林彪的“杰作”。

子：《纪要》的发现颇为“离奇”。“九一三”后清理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待过的一个地点，打扫卫生时无意中发现一个丢在那的活页拉练本里写着些东西，二十多天以后交了上去，就是后来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至今没有证据说明林彪知道它。

父：这让人感到荒唐。《纪要》如果是个军事行动计划，应该简明扼要，为什么还写了那么多的政治话、废话、骂人话，说了很多和军事行动不相干的话？

子：这些年来，研究“九一三”的人很多，最近有举证，说林彪乘的飞机已经飞近了苏联边境，然后又调过头来向中国飞回。国内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公开了那天飞机的航行图，林彪的座机空难时是在由北朝南飞的，向着祖国的方向。

父：我当时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很快就被关了起来。但我可以肯定，苏军的雷达昼夜监视着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会有记录。中苏两国敌对，对于对方的活动，特别是异常活动都有严密的监视。

子：邓小平复出后，1980年11月15日在回答美国记者时说，“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那架飞机驾驶员潘景寅的妻子向中央提出申诉，之后给家属送来了《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称：“潘景寅同志于1971年9月13日在蒙古温都尔汗飞机坠毁死亡，特向各位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望化悲痛为力量，为建设祖国和保卫祖国而努力奋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并按潘景寅原来副师级干部级别补发了抚恤金。当时正是公审林彪集团的政治环境，在一片严惩喊杀声中，如果没有对潘景寅有利的证据，不可能对他那样善后。这里有什么内幕，不得而知。

父：说有“两谋”的证言证物纰漏很多，如同当初找刘少奇的把柄一样，更像是人为地在做文章。当然，以上那些所谓的“证据”对我们从严处理起到很大的作用。毛主席是驾驭全局能力很强的老练政治家，对于重要人物的处理，如果不是极为必要和影响大局，他总是喜欢放一放，挂在那一段时间再说。对于我们几个人，有了那几个“证据”也是不够的，不能马上就下断言涉入“两谋”。为什么毛主席采用了极端手段处理我们，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在关押我的日子里，有不少征候和传言供我判断，1981年公审后我和王洪文同监居住，他讲的情况有助于揭开我心头的一些“谜”。王洪文说的事，发生在他到北京参加中央办公前的，是张春桥、



汪东兴、李德生、纪登奎向他讲的，以后的则是王洪文亲身经历和经办的，主要的事情有这么几件：

1971年9月24日凌晨，毛主席批准把我们四个人暂时隔离，有三条指示：“1、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处理他们；2、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3、时间要短，只能几天，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后来为什么对我们采取了专政措施，关起来不放了？王洪文说，康生、江青看毛主席有些犹豫，生怕他对你们宽大了，联合汪东兴等人把你们搞成了专政式监护。

毛主席起初很慎重，说：“林彪的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影响都大，要是处理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人，会伤了党的元气。”他还问了周恩来一句，“林彪坏还是叶群坏？”周答，“从老婆专政这条来说，叶群是最坏的。”毛主席没有反对周恩来的话，默认了。“九一三”后不短的一段时间里，毛主席不同意以“集团案”来追究林彪的老部下，说：“按人头来办。只要一搞集团，好多人就会搞进去了。”但是汪东兴提出：“不给他们几个人起个名字，叫起来很麻烦，横竖林彪人已经死了，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由此，“死党”这个俗语就成了我们一大批干部的“专用词”了。

子：“林彪死党”和文革初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样，毫无法律依据和界定标准，只会造成“扩大化”。

父：王洪文还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

子：恐怕他们各有各的目的。

父：叶剑英他们主要是从军队工作出发，不把我们搬开，别人就不好放手开展工作。汪东兴是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的，不“封口”不放心。

王洪文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

子：若从为首的来说，要处理黄永胜。

父：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

子：周恩来对你们与人为善，以至于毛泽东有了感觉，曾说他“对刘（少奇）的人太左，对林（彪）的人太右”。这个，我只是听说，还没证实。“九一三”以后周恩来日子非常难过，毛泽东有几次整人是对着他的。

1972年“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又像延安整风时那样向毛泽东亮出他的“底牌”，以自我诋毁的语言，用数个晚上向与会者讲自己的历史错误和罪过，沉痛地检讨，几乎是痛哭流涕。

父：周恩来不会只是单纯的检讨，他会有内涵的。

子：周恩来借此机会向大家说明了“伍豪自首”问题，防止有人在这上对他出手。从那以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就比较公开了，他对外交部一个文件批示，批评周“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报……”1974年江青到天津地区活动，在小靳庄要一名姓周的女社员改名“周克周”，说用我们这个周，克他（周恩来）那个“周”。更有甚者，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借评论《水浒传》说：“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全国开始了批宋江的运动，影射周恩来是“投降派”。周恩来在1975年9月20日进手术室之前，又一次在反驳“伍豪自首”的材料上签字，防止日后别人借此“做文章”，并悲愤地大声叫：“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父：周恩来有软弱的一面，他悲戚呀。

子：周恩来是中央专案负责人，对明显错案的李雪峰、郑维山，都不敢为他们说话，更不用说对你们了。

父：周恩来把我们的事拖着，是好心，却给了让人整死我们的机会。1973年党的“十大”要召开、要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处理我们是不可能的。

我听王洪文说，“十大”前，处理我们的事又提到日程上来，康生等人向中央提出了严惩我们的建议，但是毛主席仍然不同意对黄、吴、李、邱、李雪峰立即处理，说还是再放一个时期比较好。

子：可以看到的与此相关的资料很少，但可以查到，1973年5月25日，毛泽东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关于批林整风，他强调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犯了错误允许改过，暂时未认识到错误的可以等待。

父：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按当时的办事原则，对这样重大的问题要毛主席明确写上结论性的断语才行。

子：我对能查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检索，查了所有能找到的，有的还是权威性的。但是，凡是记载到了这儿，就闪烁其词，回避了。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决策都有毛泽东的批示，唯独这件事，却看不到他批写的文字。这样的大事“稀里糊涂”，一般不可能。

父：对高级干部处理，有开中央全会进行决议的制度。因为政治局委员是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的，对其处理，应当由中央全会来办。

子：建国以来，对高岗的处理是七届五中全会，对彭德怀是八届八中全会，对刘少奇是八届十二中全会，文化大革命后对“四人帮”的处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唯独对林案，处理政治局委员人数最多的这一次（一名副主席、两位政治局常委，八名政治局成员）却没有开中央全会，这个必须履行的组织手续，一反常规没有作。

父：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

子：毛泽东是指：对你们的处理，官僚主义式地拖下去有好处！

父：是呀！那天在场的人怕毛主席要发脾气、大发雷霆，大家都紧张得很，害怕了，因此王洪文记得特别清楚。

子：1973年7月，中央专案组提出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审查报告》，建议中央：1、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2、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动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3、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4、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个文件，由中共中央于1973年8月20日做出的决议，只有一句话：“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的报告。”这里说的“中央中央”是中央政治局新工作班子，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王洪文、华国锋、吴德等十一人，其中纪、李、汪是候补委员，而王洪文等三人连政治局成员都还不是，有效票不到政治局正式额定人数21人的一半。五名政治局委员组成的工作机构开除包括党的唯一的副主席和其他八名政治局委员，可以吗？

父：对刘少奇定性处理，是周恩来组织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办的，他们完全清楚法定程序该如何做。

子：而这一次却没开中央全会，合理的解释就是要绕过毛泽东。于8月24日至28日举行的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公报上，只明确了开除了林彪、陈伯达两人，对其他的人，含混地说同意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公开的地方看不到开除你们的字句，让人感到好像在用“障眼法”。

按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的东西，以后只有在同样的大会上才能否定，但是九年后1982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恢复李雪峰的党籍。”轻易地否定了以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父：开除我们的组织手续疑问很多，必须要当事人回忆或到档案中核查才能了解真实情况。

子：而中央现在对此封死不露，好像忌讳什么。

父：就算是开除了党籍也没有说我们是反革命，毛主席还是要把我们养起来，每月二百元钱生活费算是饭钱，住房、看病、水电杂费公家要包下来，不用自己花钱，这相当于省级高级干部的待遇。1973年10月，卫戍区里的看守人员忙碌起来为我打点行装，说是中央安置我到南方某城市居住，说好像是湖南岳阳。卫戍区看房子的人都回来了，说很快就走。可是过了很久又没有行动，耽搁了下来。看管人员对我说，公安部长李震不明不白地死在公安部办公大楼地下室里了。汪东兴提出了他的死可能与黄、吴、李、邱有关，要等李震的案子搞清楚再说，事情就拖了下来。

子：李震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李震是中国公安部长，国家专政机器的头。谁能够置他于死地，不是很明白吗？一个是他的上头（中央），一个就是他自己（自杀）。无论哪种死法，李震都是林彪案“扩大化”的牺牲品。

父：1973年的国庆期间，警三师师长问我：“你为什么没有过去那么胖，面色也不好。是否营养不够？”看管组的人代我回答：“他的饭量不大，吃的东西也不够丰富多样。”师长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出去……”他要说的话大概是“这样出去了不好看”，说到一半就停口了。师长向看管组交待：“你们明天派个人跟我到师农场去。”

第二天他们抓回来一笼子活鸡。晚饭打来了一碗鸡汤和适量的鸡肉，说：“多吃一点，长胖一点。”那天我没在意，以后每天都有一碗鸡汤，我就奇怪了，问看守人员，他们说：“我们师长在为你改善伙食。要把你的身体搞好。师长最近到中央去开过会，布置你们出去的问题。周总理有指示，要注意你们的生活，人不要搞得样子很难看。”喝鸡汤原来是要放我们出去安置的准备工作之一。

1974年元旦刚过，安置我去外地的事又忙了起来。春节前五天，看守组去外地接洽的人赶回来了，通知我做马上启程的准备。师里宣布我的看管组全体人员阴历二十九可以回去，放假一个月回家过年，他们这几年从没有离开过我。我一走，他们就“解放”了，一个个喜气洋洋，忙着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但是，对我的安置突然停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毛主席要把我们放出去“养起来”。但是上海帮和汪东兴等人抵触，说：“不能暗着走，要明着走”。不久，“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了，周恩来自顾不暇，没落实。据说，那一次安排出去“养起来”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我、李雪峰、陆定一等人。

子：你所说的逐步把对你们的惩治升级的情况可靠吗？

父：我没有准确的材料，细微之处难说，但大的轮廓是可信的。对以上说的那些事，我考虑基本是真实的，依据主要有二个：

第一、王洪文后来和我在狱中同住在一起几个月，我详细地问了他。王洪文“九一三”以后到北京参加了政治局办公，“十大”当了中央副主席、主持过中央日常工作，许多事情是他办的或知道的。

第二，我的感觉和政治判断。我们的行为，是高级干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台上执政时带有普遍性的典型。我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讨厌上海帮，就是那么多事情，拿起来千斤重，放下去半两轻。毛主席对此非常清楚，他生前并没有对我们几个把事情做绝，留有很大余地。

在中国高层政治舞台上，让哪些人在台上，让哪些人下台，让哪些人“坐冷板凳”靠边站，

是毛主席的谋略和指掌之中的事。我们毕竟很早就追随毛泽东，是他从江西中央苏区带出来的一手提拔重用的人。哪一天毛主席想到这，或者他再要打别的什么集团要利用我们搞平衡，说不定会放了我们（当然不是像原来那样的重用）。毛主席用人之道很奇特，不太讲究名分。毛泽东最痛恨的人首先要数王明，周恩来曾在王明那边，毛却放手大胆地用周。邓小平很早就是毛泽东自己的人，却两次被毛打倒了。但邓小平耐心地等待，遭受磨难，终于等到了出头的一天。我们也在等待着，等着可能会有些宽松，等着有个较好的安置，哪怕是落实毛主席说的“养起来”也好，但是毛主席病重了，无暇顾及了。

□ 原载《记忆》总 68 期

~~~~~

【亡灵祭坛】

被遗忘的“文革思想者”马正秀

• 韩三洲 •

今年 3 月以来，不少媒体纷纷纪念被公众遗忘 40 年的圣女王佩英（大中电器董事长张大中的母亲）。其实，当时还有一个与王佩英同日殉难的女英雄，她的名字与事迹依旧被我们这个公共社会遗忘着。笔者也是从最新出版的诗人、翻译家屠岸的人生自述《生正逢时》中，才读到了她的名字与事迹。她的名字叫马正秀，被杀害时正值风华正茂的 38 岁，比 54 岁的王佩英还小了 16 岁。

屠岸自述中说，1958 年，他因“反右”下放后病了，精神压力很大，引发了抑郁症。妻子请戏剧出版社的编辑赵光远每星期天来陪陪他。赵光远是重庆人，他与妻子马正秀从小青梅竹马。“文革”前，赵光远一家住在王府井大街鹁鸽胡同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两家人的交往过从有十年时间。屠岸夫妇二人对马正秀的印象很好，觉得她为人纯真，善良朴实，是穷人家的女儿。作者笔下的描述是，“马正秀给我的印象是热情而不狂放，外表柔弱，内心刚强。她对儿童有一种天然的喜爱和亲和力。她长得很美，一种纯朴无华的美，一种青春勃发的美。”

屠岸写道，1932 年出生的马正秀是幼儿师范毕业的，到北京后做自然博物馆的讲解员。“文革”时，造反派到处写打倒谁谁谁，只要是打倒某位领袖和老师的，马正秀就把“打倒”二字擦掉，再另外加上“万岁”。最突出的是，她把“打倒刘少奇”改为“刘少奇万岁”。结果于 1967 年 9 月 16 日被捕。在狱中，要她认罪，她不认。“她不像我们——我们许多人都认错，以求减轻‘罪’责。”她在狱中受尽折磨，但她昂首不屈。最后在公审大会上要她认罪，她不认，造反派的两个彪形大汉对她拳脚交加，抓着她的头撞墙，百般折磨她，她还是不认，最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她殉难的日子是 1970 年 1 月 27 日。“这些情况是后来人文社的余维馨告诉我的，他在 1969 年参加了那次宣判会，看到马正秀面临厄运，依然昂首，目光炯炯，毫无惧色。余维馨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造反派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正秀的遭遇，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而被造反派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如出一辙，他们的人格光辉永不消逝！”

然而，悲剧还没有完结。书中记载，作为丈夫的赵光远于 1969 年 3 月 5 日跳楼身亡，竟比马正秀还要先死近十个月。赵光远的“罪名”是他与华蓥山游击队（本来是革命队伍，在“文革”中被说成是“反革命”队伍）有关，说他的社会关系危险，他本人可疑。赵光远曾任孟超的剧本《李慧娘》的责任编辑。1961 年，戏剧出版社合并到人文社，成为人文社的一个编辑室，孟超任人文社副总编辑兼戏剧编辑室主任，赵光远在戏剧室当编辑。“文革”开始后，孟超成了大黑帮，被关在牛棚里，造反派让赵光远去“看管”他。赵光远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可想而知。赵光远跳楼自杀的时候，马正秀正在狱中受刑，赵是在极度不安、惶恐绝望中自杀的。

后来，有一位诗人刘岚山从屠岸口中知道了马正秀的事迹后，他很积极地访问了马正秀的女儿赵秀华，写出了《一家人》。屠岸一面读一面流泪，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他用一条毛巾擦眼泪，擦干了又流了出来，伏在床上，泪水浸湿了枕巾，心潮澎湃，无法平静。屠岸把自己的软弱同马正秀的刚强相比，感到惭愧，无地自容！他无法理解马正秀的抗争力量从何而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进行殊死的斗争，把祖国的命运和重任担在自己的肩上，最后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应该是对真理的信仰、对真理追求的执着，除了这些，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呢？

屠岸自己有过反思，为什么不争？他甚至想到了死，就是没想到反抗。最使他心潮激荡的是马正秀，她是张志新式的女英雄！是走进屠格涅夫“门槛”的女性，是中国的圣女贞德。观照自己，他认为远远不如！但是，屠岸也不同意茅于軾先生在“纪念王佩英殉难四十年”会上所讲的，那场悲剧，全国六、七亿人为之疯狂，有一半责任在老百姓。屠岸认为，这样的话，老百姓的肩膀上太沉重了，操控“文革”的“四人帮”的罪责就大大减轻了！但老百姓是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他赞同鲁迅的话，对中国老百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个情况在鲁迅时代是这样，到“文化大革命”依然如此。对老百姓，也要分析，但知识分子责任应大于工农群众。

与逐渐为更多人所知的王佩英相比，马正秀这位“文革思想者”的相关经历与事迹的文字显得更少。有一则资料，是名作家艾芜在《往事随想》一书中《夜深我走在北京的街头》一文中记述的。原来马正秀的丈夫赵光远是艾芜40年代在重庆“育才学校”的学生，是地下党员，亦是文学青年，曾在艾老主编的《半月文艺》中发表过作品。新中国成立以后，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因病退伍后，是艾芜帮其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后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68年，工宣队进驻人民文学出版社，其时赵的妻子马正秀已经被捕，罪名是贴大字报拥护刘少奇、拥护彭真，又写出打倒什么人（估计是材料上所写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成员）。工宣队进驻后，赵深感大祸临门，所以从四楼跳下，自杀身亡。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1970年1月9日的死刑判决公告，在20个“现行反革命”的死刑公告中，马正秀是第18个，这20人中，男17人，女3人，从年龄看，50—60岁的3人，30—40岁的有12人，不满30岁者（包括遇罗克）有5人。马正秀的罪名是“刻骨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常散布大量反动言论，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多次书写和公开张贴反革命标语、传单、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污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仍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而且其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其兄亦因“军统特务”被枪决。1970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同日，与王佩英等人同时遭到杀害，遇罗克则推迟到3月5日被处决。马正秀于1980年2月28日由北京中院平反，称撤销原判决书，对马正秀不追究刑事责任云云。我们至今还不知道，在这20个被枪决的“罪犯”里面，是否还有如王佩英、马正秀这样如张志新式的“文革思想者”？历史如不能还原真相，正义就无法得以伸张。

今年已经88岁的屠岸老先生，曾以一首长诗《迟到的悼歌》，发表在2000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上，以悼念这位让他终生敬重的女英雄。

□ 原载《南方都市报》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